

第四章 辗转关押

在武汉——
移押公安
厅 监狱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武汉解放，六月间方靖等人由开封转至武汉大孚银行。

这里的管理人员穿灰色制服，先也说是社会部的，后来才明确为湖北省公安厅的。

在大孚银行期间，管理工作要比开封严格一些，因为在这座楼里关押的不仅仅是他们几个战俘。但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仍旧是放任自流。

开始，似乎管理人员也想好好整顿一下。这些管理人员大多来自部队，他们在部队里自然是极好的指战员，冲锋陷阵、摧碉炸堡的行家里手，然而对于管理这些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而且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却还是新的课题。这些战俘，既顽固又有极深的世故，处境使他们非常敏感，不仅工作中稍有疏忽，会引起他们的抵触情绪，甚至一件小事、一句话，都可能给改造工作带来麻烦。譬如：他们到了大孚银行后，限制他们在楼上一间屋子里，房门前加了岗，活动范围不过是从房间走到不足三米远的厕所，既不准下棋、打牌，也不许他们交谈。

方靖就问过管理员：“既非监狱，为什么要把我们当犯人一样看待？”回答很简单：“这是管理制度的需要。”方靖便说：“好，我们服从你们的需要。既然我们不能活动，又不能讲话，那就剩下最后一点点个人自由了——睡觉！”于是倒身便睡。其它几个本来就以“嫡系”为榜样，方靖一躺，跟着也躺下了。除了吃饭、入厕，他们成天都在睡觉。

又譬如：管理人员叫他们写材料，目的、内容都没有讲清，只作原则的说明：“把你们在蒋介石集团中干过的事都交代清楚！”方靖睨视着年轻的管理人员，不禁暗暗冷笑：“我在蒋介石集团中干事的时候，老弟你还没有出生哩！”于是提笔就写：何年何月，在某军、某师、某旅、某团……任某职，驻军某地，军、师、旅、团……长姓甚名谁，出身某军校，某地人……等等，等等。这些，只能算个人简历。管理员看过后要他们重新写：“写得详细一些！”但又指不出要害，他们顶回：“我的一部历史，没有不可告人的。就是再写一千遍，没有阅历的人还是看不懂啊！”他们重新写了，只不过是字数上的增加，内容丝毫不变。

给方靖等人最大的刺激，便是飞行员白云飞的获释。到大孚银行后不久，国民党空军上尉白云飞便被释放了。过了些日子，白云飞又回到大孚银行取他存放的物件，主要是一块航空手表，因为二作需要他必须取去。他回到大孚银行，以自由人的身份去看望方靖等人，并说已重新驾驶飞机，飞了一趟广州。这件事本身对方靖等人就是个不小的刺激，不料在白云飞走后，管理人员对他们说：“白云飞是技术人员，只要交代清楚了历史，

能表示悔过自新，就可以让他立功赎罪。你们不行！你们是出不去的！”这最后一句话使方靖等人骤生反感：“好嘛！既然注定出不去了，那就等死吧！既然最终不免一死，还有什么可学习改造的呢？”

紧接着在处理张绩武的问题上，进一步增加了方靖等人情绪上的抵触，行动上的反抗。

张绩武原本是汤恩伯的部下，由汤推荐给戴笠的。起初张绩武对戴笠这个魔王也十分畏惧，见面不免战战兢兢。戴笠看出来，便对张绩武说：“我戴笠也不是青面獠牙，你怕什么，只要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戴笠与汤恩伯交厚，因此张绩武受到重用，被委任为剿警总队第二中队少将中队长，这个中队相当于一个旅的编制，装备全部是美械，战斗力颇强。蒋介石兵力枯竭之时，不得不动用特务武装抵挡一阵，结果美械装备也不堪解放军一击，张绩武终于身入囹圄，成了阶下囚。

白云飞被释放后，张绩武却被隔离了。这便引起了方靖等人的注意。方靖曾问过管理员，回答太粗糙了：“要他交代问题嘛！”其实完全应该解释清楚：张绩武属于军统特务，问题复杂，所以需要他一件一件地交代，我们还要提一些问题。你们是军界的，他的问题与你们无关，所以还是分开的好。由于管理人员没有耐心解释清楚，在方靖等人心里产生了疑惑：“是不是一个个都要隔离交代问题呢？”尤其是后来看到张绩武在单间里时而戴上手铐，时而又加脚镣，忽然被带出去，几小时或几天后又带回来。这就增加了方靖等人的反感：“啊，用戴脚镣手铐来逼迫交代问题吗？嘿，我死都不怕，还怕这一套吗？要是

把我隔离起来，我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看你能奈何我！”“就是嘛，早一天死，早一天投胎，也免得这样活受罪！”

方靖也曾趁警卫人员疏忽时悄悄问过张绩武：“喂，怎么又戴上了？”张绩武满不在乎：“嗨，我也该体验体验这些小玩艺的滋味了。”方靖便告诉米文和：“原来是‘礼尚往来’！”既然跟特务搞戴脚镣手铐的“礼尚往来”，那么，跟他们这些将军们的“礼尚往来”还能轻得了吗？轻不了又该有多重呢？为等待这个他们推论出来的“谜”底揭晓，紧张得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宁。

这样发展下去自然是很不妙的。后来还是张绩武小立一功，才稍稍解除他们一些顾虑。

有一天，管理人员又把张绩武带出去了，回来时铐回一男一女，男的是某县县长，显然是张绩武指认出来的。因为小立一功，张绩武受到优待：洗澡理发，准许他回到“集体”中来。

据张绩武说：管理人员常带他去游艺场所、车站码头，主要是指认一些漏网的特务以及军政人员。由于他曾在戴笠系统任事，结交甚广，所以在协助人民政府破案方面起了一些积极作用，要他交代的问题，也多属这方面的。

方靖等人听了才恍然大悟。

一九五〇年十月间，方靖、米文和、董汝桂、张绩武、张参议等五人（那个“县太爷”已解地方处理）由大孚银行转移至武汉循礼门刘家花园。

这天早上，管理人员对方靖等人说：“今天要送你们到一个

新的地方去，那里待遇会好一些。”方靖等人收拾行李互相嘀咕：“天堂待遇最好了！”“这新地方大概就是天堂吧！”他们总是怀疑共产党要跟他们算旧帐，所以每有变动，便以为是要送他们上断头台！

他们在大孚银行楼上关了一年半，由于从不下楼活动，又多是躺在地铺上，所以人也软了，眼也花了，一出大门就不认得东南西北，连行走都有些困难，所幸是用面包车送他们去的。

关押在刘家花园

到了刘家花园，方靖笑了，用胳膊碰了碰米文和：“在开封的话应验了——这里原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后面是看守所。民国二十七年，我由七十六师调升十三师师长，驻军潢店，郭忏任武汉警备司令，我曾到他的司令部拜访过。真可谓：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好象一场梦哩！”米文和眨着眼想了想，才记起在开封时董汝桂曾说过：“国民党造的监狱，也可以关押国民党的将军！”不禁朝方靖苦笑。

刘家花园门外挂的牌子是“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军法处”。进大门通过花园，走到里面，另有一围墙隔断，门口有一岗亭。通过岗亭，有四条放射线式的四排房子，铁门铁窗。大房间通铺可住二十人，小房间是双人铺可住十人。这一圈内便是过去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如今是四野中南军区军法处军人监狱——在二门上挂有牌子。

方靖等五人被安排在小房间里。

进了屋，管理员对他们说：“你们随便睡吧。”说完转身就走，并无多话，也未关门。五个人先还愣坐在床上，后来面面相觑，

仿佛都在向对方说：“唔——这里好象很随便啊！”于是互相挤眉弄眼，怂勇对方去“探险”。最后还是张参议忍不住，自告奋勇当了“敢死队”。他走到门前试着探头往外四下张望了一番，确信无任何阻碍了，便直起身来，拉扯了一下衣服，煞有介事地走了出去。米文和、董汝桂、张绩武也就跟着出屋。

原来这里虽名曰“监狱”，对这些战俘管理却并不严，非但不关门，各室还可以自由来往，而且拉唱声、嘻笑声不绝于耳。外面有个球场，战俘们还可以组织球队比赛篮球。

方靖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而且讲究内务整齐。尽管他当时的生活用品已经极少，却还是要仔仔细细清理、摆放一番，所以他没有随那四个出去。正当他在整理东西的时候，门外有人喊他：“喂，是老方吗？”他回头一看，立即认出门外站的一胖一瘦两个人：胖子叫刘嘉树，是十七兵团中将司令；瘦子叫张淦，是桂系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唉呀，你们怎么也在这里？”方靖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被俘将领如此之多；喜的是从此有伴了。张淦边往里走边说：“彼此，彼此！”原来他们是向广州湾突围时被俘的。

刘嘉树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在程潜手下为将，属于何应钦派的黄埔将领；张淦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在陆大十二期旁听。在桂系将领中，张淦是拔尖人物，人们称白崇禧为李宗仁的“小诸葛”，又称张淦为白崇禧的“小诸葛”。

张淦被俘后开头很受优待，让他单住在一所小洋楼里，后来待遇逐渐降格，最后送到武汉来集中。他自己尚不明白何以待遇逐渐降格，但是旁观者只要听听他所说的话，也就能够看

出七八分，并且能预料其结果。

张淦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对方靖说：“你不要怕，我们都不是凡夫俗子，共产党也要用人的。我已经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他必会采纳我的建议，到那时我们都可以有事做了。”

方靖颇为诧异：“一个阶下之囚，怎么会有如此妄想？他莫非受了刺激，得了神经病？”

原来张淦设计了一套治国“理论”，自我吹嘘如何高明，其实荒谬已极。为此，后来到了北京功德林，还开过大会小会帮助他。但他象着了魔似的，坚持认为“有理”，最后不得不将他隔离。

使方靖更加诧异的是，有人告诉他：“你的参谋长也在这里啊！”方靖曾任过六十六军军长，那是一九四三年前的事；后来调任七十九军军长，六十六军交给了副军长宋瑞珂。所以如果说是六十六军的参谋长，那已不能称其为“他的”了。而七十九军在出川以前就没有参谋长。假如是在荆门被歼以后，七十九军经重新补充恢复，有了参谋长，那也不能称为“他的”。方靖愈觉蹊跷，便要求告诉他的人，带他去看看这个“参谋长”究竟是何许人。

这个“参谋长”在方靖来到刘家花园那天起，忽然病倒在床。方靖去看望的时候，此人躺在床上以被蒙头，纹丝不动。众所周知，武汉的天气，即便是在十月份，气温也还是比较高的。能在如此气温下蒙头大睡，倒使方靖立在床前踌躇多时，不敢惊动他。后来还是引见的人，忍不住摇着那人的身子叫喊：“喂！喂！快起来呀，你的军长来看你了！”

“参谋长”突然推被坐起，倒把方靖吓了一跳！尚未明白过来，“参谋长”已扑通跪倒在他面前，叩头如捣蒜，把他弄得莫名其妙。

事情终于弄明白了：这个“参谋长”是冒牌的。方靖欲待怒斥，看看对方满头满身捂得汗水淋漓，狼狈不堪，也就不忍过分斥责了。只叹息说：“你这个人啦！为什么要冒充呢？”到此时，那人也后悔不迭：“我原是个少校，被俘后想到将来释放时，一定要按军衔发遣散费，就报了个七十九军少将参谋长的头衔。”方靖不听尤可，听了这种解释，气不打一处来，指着对方破口大骂：“糊涂蛋！你他妈的还当是军阀打仗哩。共产党只能多给你一颗子弹，还做梦要什么遣散费！你赶快滚去向管理当局坦白交代吧！”

方靖回到房里，对米文和说：“天下竟有这样糊涂的人哩！人家当了俘虏在身份不明时，总是尽量把官衔说得小些，他倒吹牛，想混什么遣散费！”米文和也叹息：“他是把战争性质弄错了。过去老蒋和我们各派军阀打仗，打败了我们，都是发遣散费的。那时发遣散费确实是按军衔；发完遣散费，如不愿回家，还可以到老蒋部队里去干。但是，我们现在是跟共产党打仗啊！可叹我们军队里一个少校，连战争的性质都没有弄清楚，我们怎么能赢得这场战争呢？”方靖激动得脸红筋胀：“岂止如此！你再看看张淦吧。真是上自将军，下至小兵，一群糊涂蛋！我们跟这样一些人为伍，死不瞑目！”

在刘家花园的最初阶段，非但行动自由，生活也照顾得特别周到：每人发给一套黄军服，三个月一双鞋。伙食两荤两素

一汤，大米白面随便吃；在押的战俘还可以请求上街买物、看病，访亲问友，写家信。

当然，仅靠管理机构发的用品，对他们这些人来讲，远远不够。但是，他们在被俘时大多身无分文，既然允许通信，便都纷纷写信给亲友，要衣物要钱。

方靖从报上得知他过去在十三师的同事傅正模（新四师师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师管区司令）起义后，在中南军区任参事，便写信去要求衣物上的帮助。傅正模接到信，即派人把自己床上的被子及新买的几套内衣送到刘家花园。方靖的儿子得信后，也从上海寄去东西。

然而，在这些人中并不都象方靖那样顺利。有的人在打仗以前，早作“后事安排”，把家眷送到海外去了，如今求告无门；有的投书如同石沉大海，因此引起十分烦恼。

原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就属于后者。

据说刘嘉树的妻子已去世，他的财产都交小舅子带走了。唯一可以求告的，是在湖南的老泰山。当然，刘嘉树也深知岳父的为人，所以并无过多要求，只因患关节炎，便求对方买几帖膏药寄来。那知这个过去享了他不少福的老泰山，在回信中说：“家境很不好，为替你买膏药，先拿皮袍子去当，无人要，只得脱下身上的纺绸大褂贱卖了，才买得这两帖膏药。”言外之意，就是以后请免开尊口。

刘嘉树本来就是个性情暴躁的人，一点小事也要骂娘，得了老泰山的回信，自不免破口大骂，其用语之粗鄙，不能见诸文字。

那些读书如百川沉大海者，在刘嘉树大骂时，也发出了共鸣。“小诸葛”张淦却还在一旁说风凉话：“你们这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乱交友未遇知音’！骂你们自己瞎了眼吧，骂别人做什么？”他那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遭到了众人的攻击。

开始加强管理
监狱

一九五一年三月间，管理员命令全体战俘带好行李去后面礼堂开会。大家以为又要转移关押地点了。却不料军法处长对他们说：不能再这样放任自流了，今后要加强管理，以利于大家的改造。接着宣布重新编组，指定房间。刘嘉树，张淦等人编入方靖、米文和一组。

散会后，各自提了行李，回到指定的房间里，尚未来得及稍定喘息，铁门关闭了，而且加了锁，过道有了持枪的卫兵。

这些原本散漫惯了的人，骤然关进房里，又无事可做，不免要烦躁生事。“小诸葛”出点子：十个人轮流敲门入厕！这一下把卫兵惹急了，门里门外发生了口角。由于门上的特制百叶窗从外可以看清屋内，从里却无法看清外面，所以卫兵看见带头闹事的干瘪老头子得意洋洋，自然十分有气，而里面的“小诸葛”尚不知外面的卫兵已气到何种程度，还在扇风点火。终于一把刺刀伸进了百叶窗，张淦害怕得连连后退，嘴却不肯软：“你要干什么？这玩艺我要过的比你见过的还多！你还真敢捅我吗？”外面把刺刀收回了，并且步履声走远。“小诸葛”自以为得计，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都说是“旗开得胜”，张淦佯作谦虚：“不！诸位，请不要用过激言词。想当初我们国军败了，中央社发布消息总是说‘战略性转移’。现在共军败了，我们也用点修

饰词，叫做——‘且战且走’！”众人刚想喝彩，急促而沉重的步履声来到门前，接着是开锁的声音。大家都以为是卫兵找来了管理员，或是越想越气，跑回来找张淦算账了。张淦也这样猜测，所以刚才还眉开眼笑的脸，顿时红了！这个原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应了他刚才讲的一句修饰词——果真是“且战且走”！嘴里嘟囔着：“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脚下却擦了油——溜到别人背后作战略性转移。

门开了，卫兵提着一个木桶放在墙角，说：“以后大小便就在桶里，每天放风时提出去倒——你们轮流值班！”又指着张淦说：“要捅你在战场上早捅了，没有我们共产党的政策，你能活到今天吗？我劝你好好想想吧！”

卫兵一走，大家都傻了。别人犹可，唯独刘嘉树不能轻饶惹了祸的张淦。他指着张淦骂：“我×你娘！人家诸葛亮借东风烧战船，破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你这个‘小诸葛’放一把野火，把我们都烧上了！堂堂国军中将要去倒马桶？他妈的，你一人去干吧！”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捶”，一时之间，张淦成了众矢之的。“小诸葛”自认晦气，缩在床角活象一个晒蔫了的茄子。

过了些日子，有一天夜里，监狱近邻失火，外面喧闹异常，战俘们也都惊醒了。管理员捧着木盒笑嘻嘻地进房来，对战俘们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只好委屈你们了。来吧，两人戴一副。”打开木盒，原来是一副副崭新的S形手铐。

手铐的滋味

第一对戴上手铐的便是原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和原国民党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接下去两人一副，很快都铐上了。

十个国民党的将军，五对面面相觑。

方靖瘦小，刘嘉树胖大，这两个人铐在一起后，便上床并排靠墙坐着，把一只“共同手”放在各自膝盖上——这应该说是最惬意的姿势。

方靖突然骂起来：“他妈的，这是那个断子绝孙的混蛋，设计出这么个小玩艺来整治人！”刘嘉树哼哧哼哧地说：“你当警备司令，拿这个小玩艺铐别人的时候，为什么不骂？”“笑话！堂堂警备司令会拿铐子去铐人吗？”“所以嘛，今天让你实际体会一下：什么叫铐子？又是什么滋味？”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吵起来。幸得旁边有人劝阻：“喂，喂，精诚团结！精诚团结！”“嘘——！现在不能说‘精诚’二字了，要说‘注意’团结！”

尽管一开始各自都采取了较舒适的姿势对付手铐，时间一长，再舒适的姿势也难以保持。一人要动，“共同手”便牵动了另一人。尤其是刘嘉树好动，现在的条件是不许乱动，他就烦躁得不时甩甩“共同手”，惹得方靖也烦躁起来，也不时甩甩“共同手”。结果是两人的“共同手”腕都磨得又红又肿，这才意识到“小玩艺”的厉害！

动极思静，方靖在回忆刚才戴手铐的刹那间。他原想抗议：“我们这些人早就准备去死了，哪个还想逃跑！这样的人身侮辱，我们决不接受！”然而，当管理员以一种不容商量的态度将手铐伸到他面前时，他骤然意识到自己是失败者，处于软弱地位，气焰打下去了，默默无言地伸出一只手。

现在既成事实，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仔细想一想。他

已预料到，这是第一次，而不是最后一次，倘若不能顺过这口气来，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当然，当时就要求方靖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即便是口头的，他也决不会答应。他当时只能这样设想：假如是我俘虏对方的高级将领，我将如何对待呢？他不能不承认，那决不能是在几年以后的特殊情况下戴第一次手铐，而是在战场上便五花大绑！这样一想，他服气了。

天亮前管理员来开了手铐，并连声说：“抱歉啊，抱歉啊！”

关门以后，实行放风制度，每天放风两次，每次一小时。有一天放风时，方靖在院子里遇见邻室的人，有人悄悄问他：“喂，你怎么还没有走？”方靖一愣：“到哪里去啊！为什么我一定要走呢？”那人告诉他：“李本一昨天解往地方去处理了。”方靖一惊：“为什么？”那人答道：“据说是地方上指名要他回去处理……”因为关门后战俘之间不准交谈，所以他们的对话不可能太多。

方靖满怀狐疑地回到房里，坐卧不宁。他反复地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解走李本一，别人就认为我也一定会解走呢？”后来他猛然省悟：李本一虽然也是第七军中将军长，但是他在安徽兼任过督察专员，据说杀了上千人之多，血债累累，地方上所以要他回去处理。“啊呀，我是七十九军中将军长，在四川兼任过四个专区的警备司令，权力比李本一大得多，别人当然会以为我也应该解回地方处理了！”

明白了这一点，方靖有好长时期忐忑不安。他不得不回忆一下自己在四川驻军四年的所作所为。他想起他的司令部驻宜

宾时，军统派了个小组在警备司令部设了个稽查处，曾经破获过两个共产党地下组织。但是，抓到的人都已押送西南行辕二处，他并没有插手。他也曾处理过几件民事案子，但是处决的为数极少。在这方面，他是有信心的——不至于有太大的民愤。唯一由他直接指挥下的，便是清剿地方武装尹禄才部。假如尹部真的是共产党地方武装，那就算一条罪状。除此之外，与共产党在战场上交锋，那是另一本账，眼下看来还不到结算这一本账的时候。

他烦恼了好多天而无结果，最后把心一横：“唉，反正欠共产党的账多了，翻开哪一笔都不得了！要杀要毙听便吧！”

关押在刘家花园的战俘有八十多名，除地方上指名要走的极少数外，绝大部分在不久之后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些人临走时，经过方靖等人的房门，还挥手道别：“再见了！再见了！”方靖等人应声：“好走啊！好走啊！到了新地方来个信啊！”但是此后他们之间始终没有通过信。

这些人走后，监狱所剩战俘只有六名：方靖、张淦、刘嘉树、米文和、中将运输司令莫德宏、四十八军中将军长张文鸿。军法处长把这六名国民党中将叫去，对他们说：“他们那些人是去劳动改造的。你们六名中将要听候中央处理，所以还留在这里。要安心学习，努力改造思想，争取重新做人。”同时腾出一间大房给他们六个人住。

人少了，管理上也不象过去那么严厉。门不上锁了，每天上午让他们在花园里做些轻便劳动。方靖最为满意的是，每天晚上卫兵在交接班时，不再进房来摸着脑袋数人头了。原来自关

门以后，规定睡觉头朝外，夜间不准开灯。卫兵每两小时换班，都要开门进来，摸着战俘的脑袋点数交班。这对于方靖那样惊醒了就很难再入睡的人来说，是很讨厌的事。

满桌佳肴，一场虚惊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把这六名国民党中将吓了一跳！监狱领导把他们叫到食堂，摆了一桌丰盛筵席，有整鸡、整鸭、整蹄膀（肘子）、全头尾鱼，请他们入席！

自从关门以后，伙食待遇降低了，由两荤两素改为两样素菜。现在摆了这么一桌丰盛筵席，请他们“随便吃”，他们受宠若惊之余，很自然要问一声：“为什么？”管理员却只说：“嗨，改善生活嘛！”他们犹不肯入席，管理员不耐烦了：“叫你们吃你们就吃嘛！”

这六名中将心里打开了鼓。

在国民党监狱里，处决犯人之前，都要让被处决的犯人吃饱喝足，谓之“送行酒”，说是免得做饿死厉鬼而阴魂作祟！这六名中将很自然将面前这一席盛筵与国民党监狱中的“送行酒”联系起来。

尽管方靖等人多次公开宣称：“死是不怕的！”“随时都准备去死。”但是，当他们以为死已来临，却也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不怕”。大家愣住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说不出话来。

当然，“死”的准备他们也确实是有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共产党真的能够给予他们宽大处理。既然无可挽回，怕也无用。所以在一愣之后，六个人不约而同地卷起了袖子。

刘嘉树第一个朝桌子走过去：“我×他娘！吃就吃！”十七兵

团司令尚未落坐，却先将一海碗红烧蹄膀端到他面前。张淦不甘示弱——第三兵团司令继进，他一进入“阵地”便包围了那一海碗红烧鸡！剩下那四个，这才发现“军情紧急”，蜂拥而上——大个子米文和毕竟占优势，他抢了那碗鸭子，并顺手将一盘鱼推给了方靖，因为他与方靖有“开封之谊”，所以处处互相照顾，现在他们俩分享鸭和鱼。莫德宏和张文鸿只好把几盘炒菜端到面前。

两个兵团司令，一上阵便动用了全部兵力——不用筷子，张开双手就抓。

“小诸葛”到底不愧有孔明之“才”，在这场战斗中，也“运筹帷幄”，采取了“逐步歼灭”战术——先打“要害”，扯下两只鸡腿，左右开弓，然后撕翅膀，吃脯肉，啄鸡脖，砸鸡脑，啃鸡脚，把最肥美的一块鸡屁股留到最后——放在嘴里细嚼慢咽，真是回味无穷！

大胖子刘嘉树比起张淦来，那只能称其为“猛张飞”了。他胸无“韬略”，什么肥呀，瘦呀，不管三七二十一，呸啾呸啾地只顾往血盆大嘴里填，一阵“猛打猛冲”，足有四、五斤重的一只蹄膀，转眼就被他消灭干净。他看看“战场”上再也没有可以“歼灭”的对象了，却还“剩勇难泄”——心犹未甘地端起海碗，咕咚咕咚一气猛灌，那一海碗油汤，被他聊以“溜缝”了。

当管理员最后端上一盆主食面条时，这六个中将都已“战斗力”耗尽了。管理员又好气又好笑，对他们说：“无论如何也得吃点面条！”他们只好再作挣扎。

回房之后，刘嘉树傻子似的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张淦忙着翻床铺，企图从床板上掰下木头丝来当牙签，米文和一个劲地要水喝，方靖不住咋嗓子，莫德宏与张文鸿却撅着嘴，一副极不愉快的样子。

饭后不动的刘嘉树，半夜却活动频繁了。一夜之间入厕八次之多，结果还是拉了一裤裆！

第二天一早，这六个人早早穿戴整齐，垂首坐在床边，连早饭都不肯再吃。管理员闻讯而来，问知原因后，叹息说：“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们吗？你们六个人要等中央处理，怎么会随随便便就枪毙你们呢？要相信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嘛！”这六个人还是不肯相信。管理员只得实说：“昨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所以给你们改善改善生活，也让你们高兴高兴嘛。”

原来是一场虚惊！

六个人因等待押赴刑场，紧张得一夜未眠，真相大白后，困劲上来了，七歪八斜地打起瞌睡来。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

六个人补足了觉，便开始追究“吃像难看”的问题——“有失将军体统”！

首先挨到重磅炮弹的是刘嘉树。心宽体才胖，刘嘉树觉得自己既然已经“偏过了”，于是闷声不响。其次遭到卷毯式轰击的是张淦。他的众怒就在于：众人被俘以后，承共产党的宽待，肉还是经常可以吃到的，鸡却久违了，他竟然独吞，真是罪大恶极！

张文鸿只吃到一些炒菜，当时便很有气，因为想到都快处

决了，还争什么嘴，所以容忍不言。现在既然还活着，而且要继续活下去，这口气不出如何能行？所以他发“炮”最多，最后一炮命中了第三兵团指挥所：“过去你（张淦）是兵团司令，处处让你占便宜。到现在你还摆司令官的臭架子，还想占便宜，真不知自爱！”

别人指责犹可，自己手下的军长也敢骂司令官了！“小诸葛”顿时变成了“小周郎”——虽不象被诸葛亮三气之后那样口吐鲜血，却也声泪俱下：“你，们，竟，敢，这，样，不，尊，重我！”于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这看起来象是笑话，其实并非笑话，它反映了当时战俘们的矛盾心理状态：既顽固，又脆弱。他们不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其中也包括他们不相信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虽然不肯承认是非正义的），因而疑心生暗鬼，也十分敏感，稍觉异样，便要“对号入座”，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五四年四月间，军法处长对方靖等人说：中南军区将移往广州，只好将他们转交给湖北省政府。

一辆大轿车来接这六名国民党中将。

三转轿口
看守所

上车后管理人员先还跟他们十分和气地交谈，车行不远，拿出了手铐：“为了你们的安全，两人戴一副，都戴上吧。”

方靖接受了上次的教训，赶紧伸出手来与米文和铐在一起。

由于两人铐在一起，下车后无法搬行李。管理人员便叫人来帮忙，这倒减轻了瘦弱的方靖的负担。于是他产生了“妙

悟”：“唔！‘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戴上手铐可以不搬行李，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此后每有转移，他就积极要求“戴上啊！戴上啊！”

砬口看守所关押着各种性质的犯人，尽管这六名战俘与那些犯人隔离，但是生活上却缺乏必要的照顾，跟其他犯人一样。这对素有啖肉之好的刘嘉树来讲，那是很难过的。因此他常常信口胡骂，骂到后来，却总是以骂他自己而告终。

原来刘嘉树当初驻军湖南，程潜在起义前曾找他商量过。这个貌似憨厚的胖子，当面说得极好：“是的，是的，程主席讲得很对——‘识时务者为俊杰’，应该起义。我回去马上向部队宣布起义！”转过脸讲的却是另一套：“我是黄埔将领，决不背弃蒋校长！”其实在这番“慷慨激昂”的表白后面，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时，刘嘉树任新一师曹万顺部的团长。该师被红军歼灭，刘嘉树也当了俘虏，国民党以六担药材将他赎回。当时红军正缺药材，六担药材可以拯救不少伤员，换他这样一个战俘自然是值得的。现在他扪心自问：当年红军释放了他，十多年中，他对共产党真是以怨报德！这样，他以为参加了起义也不会得到解放军的宽恕。所以他回部队便下令向广州湾突围！结果仍旧撞在网里。如今在铁窗之内，从报上得知一些起义将领获得了共产党和人民的谅解，并受到优厚待遇，他怎能无动于衷呢？尤其是他很清楚那些受优待的人中，有的罪恶比他大得多，他这个阶下囚怎能不诅咒自己的愚昧呢？

在硚口看守所，仍旧没有把六名战犯组织起来加强思想改造。看守所为贴补犯人们的生活所需，从外面揽来一些糊纸盒的活计，让六名战犯也跟普通犯人一样干活。这六个人倒也没有拒绝，并且毫无反应。因为有点事可做，总比无事可做好混日子一些。这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几乎没有好处。

刘嘉树先被指定为六个人的组长。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坚决反对分饭分菜。原来看守所的伙食既差又有限量，对于方靖这样食量不大的人来讲，还是可以克服的。大腹便便的刘嘉树被特佳的食欲所苦恼，就想占大家一点便宜。初到硚口，五个人都看出了苗头，所以要求分饭分菜。现在刘嘉树有了权，而且这权是共产党给的，大家只好服从，于是本来颇为紧张的副食，从此更为紧张了。大约不到十天，所长又来宣布以方靖为组长。“小诸葛”哈哈一笑：“这就告戒我们：共产党给的权，是不能滥用的。”气得刘嘉树又拍桌骂娘了。

一九五四年八月，武汉发大水，方靖等人再次由硚口转移到武昌看守所。

暂住武昌
看守所

武昌看守所的所长在方靖等人进门时就明确表示：“你们是暂时寄存在这里，时间不会太长（实际上也只不过四个月）。这里条件差，要克服克服。”可想而知，更不注意思想改造了。

在这里他们开始有点正经事可做了。新中国已建国五年，社会秩序基本安定，经过肃反镇反、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以后，国民党政府所遗留下来的人员以及与国民党官员有来往的一些人的情况，基本上已经弄清楚。有些人的问题，还需要这些战

犯予以证实或提供新的情况。因此，方靖等人经常被叫去询问，并写旁证材料。

当然，绝大部分问题他们都能认真据实回答：也有一些事情，一时难以解释清楚，或是年久忘记了。更有一些事，是在偶然情况下促成，或者背着他们干的，他们自己还蒙在鼓里，又哪里说得清呢？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句俗语，在旧社会常常听人讲，也只有旧社会才能听得见，看得到，体会得深。

一九二〇年方靖初到上海的时候，他和大哥两人举目无亲，投靠无门，不得已才铤而走险，去两广当兵。三年以后，他当了少校营长，回上海结婚，仍不富裕。按当时的习俗，新郎要给新娘打几件金银首饰，由于凑不足钱，又无处可借，只得用镀金手饰蒙混。三朝以后为新娘发觉，几乎闹得离异。又过了六年（一九三〇），他当了团长，积攒下一笔钱，托他大哥在上海南市盖了一幢二层楼小洋房。两年后（一九三二），他当到少将旅长再回上海，突然宾客盈门，三亲六眷将他包围，弄得他招架不住，便从后门溜走了。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他去南京中央干训团受训，以中将军长兼警备司令身份再到上海，短短两天时间里，请帖象雪片般的飞来，登门车拉话拽的也不知其数。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去南京两次受蒋介石召见期间，顺便去上海看望陈诚，因而在家中作短暂逗留，同样也是被素不相识的“亲戚”“朋友”包围；为了应付那些拉拽者，就给人签个名，或是赠送一张照片。他哪里想得到过去的敷衍应酬，现在竟给别人和自己带来不小的麻烦！

某人交代请他吃过饭；某人交代请他赐过名片办事；某人交代曾与他合影。最使他好笑的是：在某人家中发现挂有他一身戎装的二十四吋放大照片！而一个人的姓名，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即便所长说出了姓名，他也想不起来曾在何处见过面，在何种情况下送给对方如此大的一张照片。

事后还是通过另一个人的交代才弄清楚，原来方靖在上海确有一个交往甚密的同乡兼朋友，此人要过他一张照片，拿去复制了底片，放大数张，并转赠给乡下的朋友——地主老财。这些地主老财如获至宝，把家里供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撤掉，挂上方靖中将的二十四吋放大照片，于是指给一些保长、乡长以及下乡办兵役、催捐税的人看：“这一位是敝亲，你们见过吗？他老人家跟委员长称兄道弟，可以说是半为天子半为臣哩！”还真吓唬住一些人。

类似如此这般的事，方靖做梦也想不到，哪里能说得清呢？他倒着实焦急了一阵子，好在人民政府并不纠缠他这些扯不清的烂账，问过也就拉倒。

又一次怀疑和误会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早晨，方靖等人正在看守所院子里散步，管理员来叫他：“快去整理行李，要送你走哩。”方靖一惊：“到哪里去啊？”管理员却没有说明，只催他快去。他又紧张地问：“我们都去吗？”管理员明确回答：“不，就你一个人？”这一来，连旁听的五个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方靖本人骤然想到李本一的遭遇，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咬牙跺脚：“好，走！”

方靖整理好行李，所长来了：“北京要你去啊——是好事嘛。到了北京，归中央直接管理，就走上改造的正轨了。昨天本应该告诉你的，因为有别的事耽误了。现在你就去吧，好好学习，认真改造，一定会有出路的。”

方靖听时不住冷笑，暗想：“哼，跟我要这一套，你还差得远哩！”听完之后，便把双手伸过去：“来啊！来啊！”所长莫明其妙：“来什么呀！”方靖冷笑说：“喏——把那件小玩艺戴上吧！”所长倒被他逗乐了：“嗨，用不着，用不着。你好好跟他们去就是了。”方靖看看身旁有一个科长，一个管理员，两个跨冲锋枪的战士在等候着，更有气了：“就这么几个人送我呀！”所长摆摆手：“这就够多的了。快走吧，快点走吧，不要误了火车。”方靖气呼呼地说：“不戴手铐我也背不动行李！”把头一昂：“干脆不要行李了！”所长说：“行李怎么能不要呢？拿不动就请他们帮你拿嘛。”

方靖转身就走，并没有去向那五个人道别。因为他想到：既然‘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何必跟他们道‘再见’呢？”

从武昌过江，再坐三轮车去火车站。一路上方靖愤恨不已。因为他始终认为此去不是押赴刑场，便是押去交地方——四川处决。“哼，迟早是个死，何不早说明呢？啊，怕让我早知道了会赖在地上不肯走，要你们抬到刑场或抬到四川吗？咳！堂堂国军中将能那么蔫吗？”当他进火车站时，绷紧了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武汉——北京”这悬挂在车厢外的字牌突然闯入方靖的眼帘，他傻了！

上了车，原来是软席卧铺。

科长对方靖说：“你想吃什么，我们可以替你去买；坐累了就睡觉。现在不同了，送你去北京就是宽大政策的体现。”

方靖的嗓子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心里在翻腾，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还不住点头。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jh.com